

## FLC

翻 译 史 研 究

## “不合时宜”的情感教育： 论梁实秋译《阿伯拉与哀绿绮思的情书》

◎ 黄若泽

**内容提要:**《阿伯拉与哀绿绮思的情书》是梁实秋在《新月》上发表的第一部文学译作。本文以该书为对象,探讨译者的翻译策略和思想态度。不满于“五四”以来主观化的文学倾向和方兴未艾的革命文学浪潮,梁实秋借《情书》的翻译倡导“以理性克制感性”的理念,试图使文学和社会恢复到有序的局面。理性主义理念直接影响了梁实秋在人物塑造、结构编排和美学追求上的翻译策略。本文希望借此个案,再论新月派译者在文学与社会剧变中的“不合时宜”呼声。

**关键词:**《阿伯拉与哀绿绮思的情书》 梁实秋 情感 翻译研究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19) 02-0086-11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Title:** The “Untimely” Sentimental Education: On Liang Shiqiu’s Translation of *The Love Letters of Abelard and Heloise*

**Abstract:**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Love Letters of Abelard and Heloise* was Liang Shiqiu’s first literary translation to be published in *Crescent Moon*.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translator’s textual strategies and literary attitudes in this work. Dissatisfied with the subjective writing since the May Fourth period and the new trend of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Liang Shiqiu proposed the idea of “subjecting emotions to reason” in his translation in order to restore the healthy and harmonious state to literature and society. It is found that Liang Shiqiu’s rationalist thinking greatly influenced his translational strategies regarding the shaping of characters, organization of the plot and his aesthetic pursuit in general. With this case study, this paper aims to shed new light on a *Crescent Moon* translator and his “untimely” remedies for the tremendously changing literature and society.

**Keywords:** *The Love Letters of Abelard and Heloise*, Liang Shiqiu, sentiment, translation studies

**Author:** Ruoze Huang, Assistant Professor,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China.

1928年10月，留美回国已经两年的新月派文艺理论家梁实秋，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他翻译的小说《阿伯拉与哀绿绮思的情书》（*The Love Letters of Abelard and Heloise*）节选。这是梁实秋第一次在《新月》上发表文学译作。同年11月，新月书店即发行《情书》单行本；1930年再版，1931年三版。1931年11月徐志摩遇难后不久，《新月》停刊，新月社解散。《情书》版权遂转让给商务印书馆，并编入后者主办的“世界文学名著丛书”重新出版。此后，商务印书馆又于1935年12月和1938年6月两度再版该书。1987年，台湾九歌出版社重印梁实秋的译本，并附上译者本人写于1986年的长文《人生就是一个长久的诱惑——关于阿伯拉与哀绿绮思》。梁译《情书》经久不衰，文学价值可见一斑。

毫无疑问，梁实秋在翻译上最瞩目的成就，“就是用了三十七年的时间（1931—1967）独自译完《莎士比亚全集》”（白立平，《梁实秋翻译思想研究》2）。可是，这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阿伯拉与哀绿绮思的情书》或仅仅被解读为“实在与我们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差不多”（叶灵凤3），或只是简单地被概括为“与译者文艺思想以及社会背景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未做深入探讨（白立平，《翻译家梁实秋》130）。问题在于，作为以理性主义著称的新月派理论家和批评家，梁实秋为什么选择以《阿伯拉与哀绿绮思的情书》开始他在《新月》上的文学翻译活动？这部译作与他的文艺思想有什么关系，又是如何回应20世纪20年代末的社会语境？

本文认为，《阿伯拉与哀绿绮思的情书》既是梁实秋本人思想历程的缩影，也是他对社会剧变所持态度的流露。该书提倡的“以理性制裁情感”的情感教育主张，一方面包含了他对“五四”以来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全面反思，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对于革命文学的审慎态度。有鉴于此，本文以《阿伯拉与哀绿绮思的情书》为中心，试从20年代末的中国文学语境分析文本内外的思想意涵，讨论译者梁实秋对于文学家应如何应对社会变革的思考。

## 一、克服情感病：新文学脉络中的梁译《情书》

《阿伯拉与哀绿绮思的情书》是法国中世纪经院哲学家阿伯拉与哀绿绮思的恋爱书信集。阿伯拉在担任巴黎主教座堂教师期间，爱上教士福尔伯特的侄女哀绿绮思。私情败露后，两人逃往布列塔尼结婚生子，但阿伯拉却被福尔伯特派人施以宫刑。遭此变故，阿伯拉劝说哀绿绮思进入巴黎郊外的一所修道院当修女，他自己也成为一名修道士。两人从此再也没有一起生活。直到哀绿绮思得知阿伯拉的自传出版，她才向阿伯拉寄出第一封信。在后来的通信中，哀绿绮思不断表达对阿伯拉不变的爱意，愿继续承受过去的痛苦和眼前的煎熬，等待未来的美好团聚。阿伯拉则逐渐从最初的悲伤中恢复过来，力劝哀绿绮思收起激情，接受上帝的管束。

《阿伯拉与哀绿绮思的情书》的翻译始于1928年的北平暑假。根据梁实秋本人的回忆：“北平的夏季很热，但是早晚凉。我有黎明即起的习惯，天大亮之后我就在走廊上借着藤桌藤椅开始我的翻译，家人都还在黑甜乡，没人扰我，只有枝头小鸟吱吱叫，盆里荷花阵阵香。一天译几页，等到太阳晒满了半个院子我便停笔。一个月后，书译成了。”（1987版《情书》5-6）

当他从北平家中度完暑假回到上海，恰逢《新月》需要稿件，于是就把《情书》第一、二函发表在当年10月刊印的《新月》第1卷第8号上。

梁实秋的回忆充满宁静而祥和的田园气息，似乎符合这位理性主义者的思想世界。但实际上，梁实秋早年也继承了自晚清延续至“五四”的浪漫主义文学风气。1915年，梁实秋考入清华学校，开始文学创作活动。他曾热情洋溢地写道，“新诗是一个自由开放的园地，有青春的热情就可以写诗，近于胆大妄为”（《副刊与我》65）。曾与梁实秋自费刊印《冬夜草儿评论》的闻一多甚至把他与郭沫若并举，认为“现今诗人除了极少数的——郭沫若君同几位‘豹隐’的诗人梁实秋君等——以外，都有一种极沉痾的通病，那就是弱于或竟完全缺乏幻想力”（69）。在其文学生涯的初期，梁实秋确曾与创造社几位最具活力的成员交往密切。当他于1923年8月赴美留学之时，前来送行的朋友“只有创造社的几位”（梁实秋，《海啸》49）。1926年初，仍在美国的梁实秋写下投石问路之作《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续）》，连载在由徐志摩担任主编的北京《晨报副刊》上。他将新文学运动的精神概括为“处处要求扩张，要求解放，要求自由”；在这样的诉求下，“情感就如同铁笼里猛虎一般，不但把礼教的桎梏重重的打破，把监视情感的理性也扑倒了”（61）。

事实上，梁实秋早期的浪漫主义气质在赴美留学之后就已悄然发生转变。1924年秋，梁实秋进入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并选听白璧德（Irving Babbitt）教授开设的“16世纪以后之文艺批评”课程。正是在这位人文主义大师的影响下，他的思想“从极端的浪漫主义，转到了多少近于古典主义的立场”（《关于白璧德先生及其思想》548）。因此，写作《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续）》一文的真正目的其实是要批评新文学运动不过是一场浪漫的混乱，混乱的根源正在于“我们新文学运动对于情感是推崇过分。情感的质地不加理性的选择，结果是一、流于颓废主义，二、假理想主义”（梁实秋，《趋势》61）。这可以视为梁实秋从浪漫主义走向理性主义的开端。

1926年夏，梁实秋留美回国，不久加入新月阵营，先后出版《浪漫的与古典的》和《文学的纪律》两部文集，逐渐尝试用古典主义文艺理论开展文艺批评。在1928年3月《新月》创刊号上，他发表了批评论文《文学的纪律》，更加清晰地表明了自己的文艺态度：“文学的力量，不在于开扩，而在于集中；不在于放纵，而在于节制。”“所谓节制的力量，就是以理性（Reason）驾驭情感，以理性节制想象”（18）。他进而号召中国作家应向伟大的文学家学习，把情感放在理性的缰绳之下。可以说，《阿伯拉与哀绿绮思的情书》的翻译正是梁实秋的理性主义理念在翻译事业上的延续，反映了他试图克服浪漫主义情感病的期望。

## 二、“以理性制裁情感”：《情书》的翻译策略

《阿伯拉与哀绿绮思的情书》最早以拉丁文出版于1128年前后，又于1616年出版于巴黎，此后版本繁多，流传甚广。梁实秋翻译所据的底本，是英国伦敦邓特父子出版公司（J. M.

Dent and Sons)发行的英译本,“薄薄的一小册,是我的朋友瞿菊农借给我看的”(1987版《情书》5)。该版在1901年问世,由莫尔顿(Honor Morten)编注,收入风靡一时的庙宇古典丛书(Temple Classics)。梁实秋一度有意对《情书》的英译情况作一番更深入的考察。但直到翻译完成之际,他也仍不得不承认“英译本哪一种最好,我不晓得”(《翻译》6)。直到当年12月,他才收到胡适寄来的英文足本。但此时《情书》已经出版许久。

事实上,在当时流行的《情书》诸多版本中,定位为大众通俗读物的庙宇版选择以1722年的某无名氏版为其底本。虽然不是对原作的直接翻译,但编者莫尔顿宣称,该书“以流畅的笔调和同情的立场最好地呈现出原著的精神”(i)。但恰恰是对原作感情一面的强调引起了梁实秋的重视和警觉。他在当年8月20日写的“译后记”中说道:

“情书”是一个很诱人的题目,那一个青年男女看见“情书”能不兴奋?我不是要在青年的欲焰上再浇油,我觉得煽惑感情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把情感注入在正轨里,不使其旁出斜溢,这才是正当的工作。诱发情欲的书多得很,当今不少一束一束的情书发表。但是这一部古人的情书,则异于是。里面情致虽然缠绵,文辞却极雅驯,并且用意不在勾引挑动,而在情感的集中、纯洁而沉痛,由肉的爱进而为灵的爱,真可谓超凡入圣,境界高超极了。[……]在现今这个人欲横流的时代,我们要努力的该是以理性制裁情感,像我如今译的这部精神的情书,大概是不合时宜罢?(1928版《情书》194-96)

这种对情感加以节制的主张,正是对梁实秋此前有关理性主义论述的绝佳呼应。在梁实秋看来,书中倡导的那种冷静克制的爱恋才是表达感情的正当方式。虽然他不无担心这一立场与风靡一时的文学潮流相抵触,但正因为该书的反潮流特色,即“不合时宜”,他才希望借西方古典主义文学的力量为时人的生活态度和文学创作树立起情感的典范。这一考虑也极大地影响了他针对底本不同状况所采取的翻译对策。

首先,在反映主人公阿伯拉理性主义哲学观的关键段落,梁实秋的译文往往相当忠实于原作。事实上,“以理性制裁情感”一语就出自梁实秋的译笔。在第五封信中,阿伯拉劝告哀绿绮思放下热烈的感情,转向上帝的信仰。梁实秋这样翻译:

Abelard: Govern yourself by my example; I was born with violent passions, I daily strive with tender emotions, and glory in triumphing and subjecting them to reason. (Morten, *Love Letters* 81)

阿伯拉:你依着我的榜样治理你自己罢;我是生而有激烈的热情,天天和情感争斗,终于得到胜利,把情感受到理性的制裁。(1928版《情书》164)

试比较哀绿绮思对世俗爱情的持久态度:

Heloise: Among those who are wedded to God I am wedded to a man; among the heroic supporters of the Cross I am the slave of a human desire; at the head of religious community I am devoted to Abelard alone. (Morten, *Love Letters* 36)

哀绿绮思：她们是嫁给上帝的，我是嫁给一个男人；她们是十字架之侠义的拥护者，我是人欲的奴隶；在一个宗教团体之上，我只对于我的阿伯拉忠诚。（1928版《情书》74-75）

以上两段译文展现了两位主人公的思想差异，尤其是阿伯拉对哀绿绮思的规劝。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梁实秋本人的立场与阿伯拉的理念大致相仿，即赞成收起感性的锋芒，将人的情感交由理性来管理。这样的例子不仅在译作正文中比比皆是，也见于1928年9月10日梁实秋译作发表前《新月》预先发布的一段广告：“这是八百年前的一段风流案，一个尼姑与一个和尚所写的一束情书。古今中外的情书，没有一部比这个更为沉恻、哀艳、凄惨、纯洁、高尚。这里面的美丽玄妙的词句，竟成后世情人们书信中的滥调，其影响之大可知。最可贵的是，这部情书里绝无半点轻狂，译者认为这是一部‘超凡入圣’的杰作。”（《广告》10）这则文字无疑给梁实秋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他在晚年的回忆里还特别提到当年的广告，尽管也承认“总不免多少有些夸张”（1987版《情书》7）。所谓“夸张”者，指的是“纯洁”“高尚”“超凡入圣”等刻意铺排的宣传用语。他们并非出自英文原著，而是译作中添加的字句。有论者甚至推测这些词句很可能就出自梁实秋本人的手笔（Pan 35）。

这一推断虽无确凿证据，但也不无道理。这是因为，梁实秋在译作中的确频繁使用中国佛教词汇，以此来比附原作中基督教思想的爱情观。这种“以中化西”的翻译手法在《情书》收录的第三封信中体现得最为集中。这封信是由阿伯拉写于哀绿绮思发出第一封信之后，他试图说服哀绿绮思放下激情，投入上帝的怀抱。然而，梁实秋的译文却将原著变成某种中西宗教的混合体：

Abelard: I hoped too that God would have delivered me from the tumult of my sense. (Morten, *Love Letters* 45)

阿伯拉：我也希望上帝把我从色相的纷扰之中救起。（1928版《情书》93）

Abelard: To make it more easy consider why I pressed you to your vow before I took mine [ . . . ] (Morten, *Love Letters* 51)

阿伯拉：你试想想看，为什么我在出家之前，先强迫你舍身 [ …… ]（1928版《情书》105）

Abelard: After such a revenge taken on me you could expect to be secure nowhere but

in a convent. (Morten, *Love Letters* 51)

阿伯拉：我受了那样的报复之后，你简直没有安全的地方，除了尼庵。(1928版《情书》106)

这就引出梁实秋的第二种翻译策略。针对基督教的专有概念，他并不追求宗教意涵上的严格对应，而是将他们一一转化为中文读者耳熟能详的佛教词汇。可见，他的翻译并非要介绍原作的基督教文化背景，而是不断用功能性的实用立场，增强对中文读者的思想说服力。与此相配合，梁实秋还一并省略了英文原著的页边注，以及文末长达22页的专门阐释文化背景的尾注。因此，与其责备梁实秋忽视了宗教概念的形式对等，不如说他更注重译文在传达文学效果上的动态对等。其用意在于让中国读者无偏差地捕捉到原著的道德寓意，即“激情应该受到理性”约束这条真正的教益。

这种思想上的考虑还进一步影响到译本的结构编排，即梁实秋翻译中的第三种策略。收进庙宇古典丛书的英文底本其实包含了四个部分：一、英译本编者序；二、六封信函；三、英国诗人蒲柏（Alexander Pope）的诗歌《艾洛伊莎致阿伯拉》（“Eloisa to Abelard”）；四、附录注释。但需要追问的是，庙宇版中的蒲柏原诗长达15页，梁实秋为什么连如此重要的内容也放弃不译呢？

表 1: 1901 年 Temple 版底本与 1928 年梁译新月版结构对照表

序号	The Temple Classics (1901)	1928 年新月版
1	Introduction	英译本编者序
2	Six Letters	六函
3	Pope's Epistle: "Eloisa to Abelard"	(未译)
4	Notes	(未译)
5		译后记(新增)

我们知道，蒲柏在1717年以阿伯拉与哀绿绮思的故事为蓝本，创作了著名的诗歌《艾洛伊莎致阿伯拉》。不过，蒲柏参照的并非拉丁文原著，而是休斯（John Hughes）1713年的英译本。这一选择不只是出于蒲柏与休斯私交甚笃，它还反映了蒲柏对休斯版本的高度认同，因为正是休斯的版本为蒲柏的名作奠定了内容的基础和情感的基调。根据1871年版《蒲柏作品集·诗歌卷（二）》（*The Works of Alexander Pope: Poetry, vol. 2*）编者的统计，蒲柏在诗作里对休斯著作的直接引用竟多达50处（Pope 237-57）。本来，在庙宇版中，阿伯拉与哀绿绮思的信函各占三封，双方观点尚且处于势均力敌的地位。但在蒲柏笔下，原本是由两人分别说的话都交由艾洛伊莎这个全新的女性角色来完成（Wright 519）。如此一来，阿伯拉便几乎被移出故事的主线，同时艾洛伊莎则变成一位“情感的艺术家”（Wallace 421）。艾洛伊莎所写的书信也就成为“自由恋爱之乐的动情宣言，宣告着她对律法与社会习俗的背叛和对不法激情之

乐的拥抱”(Wallace 418)。

这种对于情感的无限推崇，恰恰是梁实秋的顾忌所在，因此该诗被删也就情有可原。但梁实秋并未就此止步。在《情书》出版的第二年，他又在《新月》上发表《谈谈蒲柏》一文，专门阐释他对新古典主义诗人蒲柏的审慎态度。他主张将蒲柏的批评与蒲柏的诗歌区别对待，因为“蒲柏的批评虽然是集新古典主义的大成，而他的诗也有浪漫的成分”。他特别指出：“例如《哀绿绮思写给阿伯拉的信》，这首诗写得极诚挚动人，很有一点感情的渗入，因此当时也有人指为不道德。”(11-12)此文无疑表露了梁实秋在翻译《情书》时删去蒲柏诗作的真实考虑：蒲柏的诗歌正是因其激情过剩、有伤理性，因而难以进入情感教育的行列。换言之，梁实秋翻译《情书》的核心关切正是文学的道德性。

### 三、面对文体变革：《情书》与梁实秋的艺术论辩

如前所述，梁实秋选择以《阿伯拉与哀绿绮思的情书》作为登上《新月》后发表的第一部文学译作，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表达他对新文学风气的强烈不满。事实上，无论是当初《新月》广告中所谓“一束情书”，还是他在译后记中提到的“一束一束的情书”，都是有所指的。据梁实秋晚年的回忆，“因为当时坊间正有一本名为《情书一束》者相当畅销，很多人都觉得过于轻薄庸俗，所以我译的这部情书正好成一鲜明的对比”(1987版《情书》7)。

这里提到的《情书一束》，其实是文学青年章衣萍编著的一本现代短篇小说集。该书虽为梁实秋所不齿，但实际销量不容小觑。《情书一束》自1926年5月初版后便畅销不止，至1930年3月已印出9版约25500册，甚至还有俄文译本问世(徐建辉、徐俊103)。此后作者又趁机推出《情书二束》，详细描写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三角恋故事。章衣萍的作品中往往有许多展示情欲或裸露身体的成分，这在梁实秋看来是相当“浅薄无聊”的，“一味以秽语装饰门面”！他后来甚至还指名道姓地斥责：“像章衣萍一类的作品，较《性史》固胜一筹，然而他披着文学的衣裳，卖弄着性欲的诱惑，其品更下！”(《论文学里的秽语》)梁实秋对章衣萍的不满再次证实了“五四”以来崇尚个人主义和情感至上的文学潮流之盛，但更重要的是指出了书信体文学与这种潮流兴起之间的隐微关联。诚如陈平原所言，在由《狂人日记》开创的新文学传统中，“‘独白’(包括日记体、书信体小说)几乎成了‘五四’作家最喜欢采用的小说形式”。这固然要归功于从文言到白话的语言变革，使“我手写我口”的叙事方式成为可能；但同时也牵涉到个性解放的时代精神，而独白体文学就直接指向“一个充满创新精神与反叛意识的朝气蓬勃的时代”(116)。书信体小说或稍有不同。在1923年出版的一部《小说作法讲义》中，“书简式”小说被定义为“一种包含着主观和客观的，一面抒发主观，一面叙述客观的小说”，且有“对话的”和“独语的”两种类型(孙俚工206)。不过，章衣萍的情书系列作品虽由不同人的书信往来组成，可是也正如陈平原在概括现代书信体小说的总体特征时所说，“大都只是一方的倾诉，而没有另一方的回应，故是‘独白’而不是‘对话’”(116)。

果不其然，在《倚枕日记》序言中，章衣萍本人就引用卢梭《忏悔录》(Confessions) 第一篇的开章宣称：“我在这些日记上不曾丝毫将自己粉饰。我也同那可怜而伟大的卢骚一样，大声疾呼的说：‘这就是我所做的，这就是我所想的，这就是我自己。’”(1-2) 俨然视这位西方浪漫主义思想家为精神偶像。换言之，梁实秋的“不合时宜”之语无疑浓缩了他对浪漫主义情绪及其哲学精神的整体不满。这在他后来的总结中得到相当准确的概括：“以我个人而论，我当时的文艺思想是趋于传统的稳健的一派，我接受五四运动的革新的主张，但是我也颇受哈佛大学教授白璧德的影响，并不同情过度的浪漫的倾向。”(《忆新月》69)

实际上，梁实秋对章衣萍的批判触及到了书信体文学背后的浪漫主义思想根源。根据西方文学史学者的研究，文学史中的现代主体在18世纪晚期初步确立，以此为主题的新文学作品也随之兴起。而这个潮流的涌现正是广泛借助了书信体、日记体和第一人称叙事等自传体文类的丰富手法(Stelzig1-2)。在这个过程中，卢梭的一系列自传性作品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蒲柏的诗歌《艾洛伊莎致阿伯拉》于1758年被翻译成法语，卢梭则在一年前率先完成书信体小说《新爱洛依丝》(Julie, or the New Heloise) 第一版的四个部分，又在1758年末完成最终的六部分版本。在此，“新爱洛依丝”(即梁实秋笔下的哀绿绮思)作为小说副标题的真正意图正是要重写中世纪的阿伯拉与哀绿绮思故事，创造一个“属于我们时代的哀绿绮思”(Stewart xii)，“一个现代的哀绿绮思”(xiv)。从这个意义上说，哀绿绮思的书信写作就成为现代情感想象中的核心问题，而梁实秋正是通过《阿伯拉与哀绿绮思的情书》的翻译参与到现代主体的论争中来。他试图选取卢梭之前的古典主义文本，为浪漫的中国注入一股看起来反潮流的理性精神。在翻译过程中，他一方面注意到阿伯拉丰富多元的身份，即“一个有独立思想的学者，一个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且是一个热情洋溢的人”(1987版《情书》17)，另一方面则有意强调阿伯拉与哀绿绮思两人“互相勉励，完成了他们的至高纯洁的志愿”，从而大大拓展了《情书》的思想深度(22)。

使问题更复杂的是，20年代的社会风潮毕竟不同于“五四”初期的状况，浪漫主义的危险也不再限于文学中的道德败坏和世风日下。1925年的五卅惨案和1927年的蒋介石政变等政治事件的接连发生，使中国现代作家纷纷从个人化的情感世界中猛省过来，并迅速转向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以适应革命新形势的需要。当年送别梁实秋赴美的创造社成员成仿吾便在1928年2月《创造月刊》上发表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文，批评“五四”文学的视野过于狭隘，号召今后的文学创作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走向代表普罗阶级的革命文学。可是，梁实秋却对革命文学理念表达了不同的看法。1928年6月，他在《文学与革命》一文中对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倾向做了一番社会性的阐释：“浪漫运动根本的是一个感情的反抗，对于过分的礼教纪律条规传统等等之反动，这种反抗精神若在事实方面政治或社会的活动里表现出来，就是革命运动。”(7)“文学也罢，革命也罢，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冷静的头脑”(11)。这就全面批评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整个脉络。

梁实秋的个人见解很快成为新月派的共同主张。三个月后，也就是《情书》发表的前一期，

《新月》首先登出一则“编辑余话”，回顾并检讨了《新月》创刊半年多来内容日渐“沉重”的趋势。“因此我们决定从下期起要略略添点轻松的色彩，使读者不至于感觉到过分的严正。这并不是要改变态度，那‘郑重矜持’的决心我们还始终要维持”（《编辑余话》1）。这份申明一方面呼应了《新月》在创刊号中就已定下的“郑重矜持”基调，另一方面也为下一期梁实秋译作的登场作了思想上的铺垫。

值得一提的是，在后来与鲁迅的翻译之争中，《阿伯拉与哀绿绮思的情书》再次成为梁实秋阐述其翻译思想的重要论据。从一开始，梁实秋就以自己翻译的《情书》为例，强调译文应尽可能文从字顺，照顾译入语读者的理解和接受。他在1928年的《翻译》一文中写道：“翻译的头一个条件是要使人看得懂，然而这个条件就不容易做到。”他坦言，《情书》作为一部转译作品，在语言上自有其特殊之处。“我所根据的英文本子，据说不但保存了原作的精神，即是拉丁文的语法，也似乎充分的表示出来了。”在同一篇文章里，他又以“勾圈涂改”之语暗讽鲁迅的译文虽然同为转译，却令读者无所适从（5）。

1930年，梁译《情书》由新月书店再版。在此之前，梁实秋已经收到并读毕胡适寄赠的英文全译本，并清楚地了解两个英文本的区别。可是，他在1929年12月落笔的“再版后记”中却再次声明，翻译该书的初衷绝不是为了“局部的真假”和“考据的事”。相反，他所看重的优点在于，“我所根据的英译本虽然是不完美的，但是文笔最流畅显豁”，“所以我还是由它再版了”（《再版后记》3-4）。梁实秋反复强调译作的文笔和神采，无不指向鲁迅一贯以来试图用翻译改造汉语的“硬译”主张。1932年，梁实秋又提出“不以改良国文和翻译搅成一团”，强调“翻译的目的是要把一件作品用另一种文字忠实表现出来，给不懂原文的人看”（《翻译要怎样才能好》）。有论者曾言，“在政治上，梁实秋反对暴力革命；在对待文字改革问题上，也反对‘革命的手段’，这一点是与他的文艺思想一致的”（白立平，《梁实秋翻译思想研究》22）。在梁实秋心目中，汉语的改革应以渐进的方法进行，不应以革命的手段一蹴而就，而这些理念都延续了他自翻译《情书》以来的思考。

在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社会发生巨变的转折期，梁实秋试图借《阿伯拉与哀绿绮思的情书》的翻译提倡以理性克服感性的美学理念。理性主义的理念也直接影响了梁实秋在人物塑造、结构编排和美学追求上的翻译策略。从个人层面来说，《情书》的翻译是梁实秋本人由浪漫主义走向理性主义的思想缩影，也是对“五四”以来毫无节制的个人化和主观化文学倾向的有力回应。在这场论辩中，梁实秋选择性地吸收卢梭之前的西方文艺思想，借此检讨书信体写作所隐含的浪漫主义诉求，并在语言上反对鲁迅提倡的“硬译”主张。

不仅如此，梁实秋在《情书》中的态度也反映了新月派及自由主义文人面对社会剧变的整体立场。1929年3月，即《情书》出版半年后，《新月》刊登这样一则“编辑后言”：“我们本想为这时代，为这时代的青年，贡献一个努力的目标：建设一个健康与尊严的人生，但是我们微薄的呼声如何能在这闹市里希冀散布到远方？[……]这里只是站立在时代的低洼里

的几个多少不合时宜的书生，他们的声音，即使偶尔听得到，正如他们的思想，决不是惊人的一道，无非是几句平正的话表示一个平正的观点，再没有别的——。”（《编辑后言》1）在此，“不合时宜”俨然成为新月派的集体心声。对于这些秉承自由主义理念的新月派文人来说，他们所认同的是“在现状的基础上逐步改革，逐步以人的理性的力量改变现存制度中不令人满意的方面，实现更美好的社会”（李强 261）。对梁实秋本人而言，当浪漫主义思潮将忧郁的社会个体转变成狂热的革命分子时，他并未深究二者内在的根源有何不同，而是从其整个脉络中抽离出来，并迅速发起思想上的批判。梁译《情书》的思想立场表明，他为社会剧变开出的药方也恰恰是情感的教育和道德的规训，可是这又岂是几封情书所能办到？

### 引用文献 [ Works Cited ]

- Abelard, Peter. *The Love Letters of Abelard and Heloise*. Translated by Shiqiu Liang. The Crescent Moon Bookstore, 1928. [阿伯拉：《阿伯拉与哀绿绮思的情书》，梁实秋译。上海：新月书店，1928。]
- . *The Love Letters of Abelard and Heloise*. Translated by Shiqiu Liang. Chiu Ko, 1987. [阿伯拉：《阿伯拉与哀绿绮思的情书》，梁实秋译。台北：九歌出版社，1987。]
- “Advertisement: *The Love Letters of Abelard and Heloise*, Translated by Shiqiu Liang. In Print.” *The Crescent Moon*, vol. 1, no. 7, 1928, p. 10. [《广告：〈阿伯拉与哀绿绮思的情书〉梁实秋译，在排印中》，载《新月》1928年第1卷第7号，第10页。]
- Bai, Liping. “A Study on Liang Shiqiu’s Translation Theories.” *Tamkang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o. 32, 2007, pp. 1-32. [白立平：《梁实秋翻译思想研究》，载《淡江人文社会学刊》2007年第32期，第1-32页。]
- . *Liang Shiqiu: The Translator*.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 [白立平：《翻译家梁实秋》。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 Chen, Pingyuan.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rrative Modes in Chinese Fiction*. Peking UP, 2010.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Editorial Afterword.” *The Crescent Moon*, vol. 1, no. 7, 1928, pp. 1-2. [《编辑余话》，载《新月》1928年第1卷第7期，第1-2页。]
- “Editorial Afterword.” *The Crescent Moon*, vol. 2, no. 1, 1929, pp. 1-2. [《编辑后言》，载《新月》1929年第2卷第1期，第1-2页。]
- Hu, Shi. “On Translation.” *The Crescent Moon*, vol. 1, no. 11, 1929, pp. 1-10. [胡适：《论翻译》，载《新月》1929年第1卷第11号，第1-10页。]
- Li, Qiang. *Liberalism*. China Social Sciences. 1998. [李强：《自由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 Liang, Shiqiu. “The Romantic Trend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continued).” *The Morning Post Supplement*, 27 Mar. 1926. [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续）》，载《晨报副刊》1926年3月27日。]
- . “The Discipline of Literature.” *The Crescent Moon*, vol. 1, no. 1, 1928, pp. 11-28. [梁实秋：《文学的纪律》，载《新月》1928年第1卷第1号，第11-28页。]
- . “Literature and Revolution.” *The Crescent Moon*, vol. 1, no. 4, 1928, pp. 1-11. [梁实秋：《文学与革命》，载《新月》1928年第1卷第4号，第1-11页。]
- . “Translation.” *The Crescent Moon*, vol. 1, no. 10, 1928, pp. 4-6. [梁实秋：《翻译》，载《新月》1928年第1卷第10号，第4-6页。]
- . “Some Remarks about Pope.” *The Crescent Moon*, vol. 1, no. 11, 1929, pp. 10-13. [梁实秋：《谈谈蒲柏》，载《新月》1929年第1卷第11号，第10-13页。]
- . “Reprint Afterword.” *The Love Letters of Abelard and Heloise*, by Peter Abelard, translated by Shiqiu Liang, The Crescent Moon Bookstore, 1930, pp. 1-4. [梁实秋：《再版后记》，载阿伯拉著、梁实秋译《阿伯拉与哀绿绮思的情书》（上海：新月书店，1930），第1-4页。]

- . “A Newsletter: How Can a Translation be Good?” *Literary Weekly of Social Welfare*, no. 5, 10 Dec. 1932. [梁实秋:《通讯一则——翻译要怎样才能好?》, 载《益世报·文学周刊》第5期, 1932年12月10日。]
- . “On Dirty Words in Literary Works.” *Literary Weekly of Social Welfare*, no. 42, 16 Sept. 1933. [梁实秋:《论文学里的秽语》, 载《益世报·文学周刊》第42期, 1933年9月16日。]
- . “The Tsunami.” *Miscellaneous Memories in Qiushi*. Biographical, 1985, pp. 49-54. [梁实秋:《海啸》, 载梁实秋著《秋室杂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1985), 第49-54页。]
- . “In Memory of *The Crescent Moon*.” *Miscellaneous Memories in Qiushi*. Biographical, 1985, pp. 65-78. [梁实秋:《忆新月》, 载梁实秋著《秋室杂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1985), 第65-78页。]
- . “The Supplement and Me.” *The Essays of Liang Shiqiu*, Qunzhong, 1995, pp. 65-79. [梁实秋:《副刊与我》, 载梁实秋著《雅舍散文》(北京:群众出版社, 1995), 第65-79页。]
- . “On Mr. Babbitt and His Ideas.” *The Collected Essays of Liang Shiqiu*, vol. 1, Lujiang, 2002, pp. 546-52. [梁实秋:《关于白璧德先生及其思想》, 载《梁实秋文集》(第1卷)(厦门:鹭江出版社, 2002), 第546-52页。]
- Morten, Honner. Introduction. *The Love Letters of Abelard and Heloise*, edited by Morten, J. M. Dent and Sons, 1901, pp. i-ii.
- Morten, Honner, editor. *The Love Letters of Abelard and Heloise*. J. M. Dent and Sons, 1901.
- Pan, Lynn. *When True Love Came to China*. Hong Kong UP, 2015.
- Pope, Alexander. *The Works of Alexander Pope: Poetry*, vol. 2. Edited by Whitwell Elwin. London: John Murray, 1871.
- Stelzig, Eugene L. *The Romantic Subject in Autobiography: Rousseau and Goethe*. Virginia UP, 2000.
- Stewart, Philip. Introduction. *Julie, or the New Heloise: Letters of Two Lovers who Live in a Small Town at the Foot of the Alps*, by Jean-Jacques Rousseau, translated by Philip Stewart and Jean Vaché, UP of New England, 1997, pp. ix-xxi.
- Sun, Liangong. *Lectures on the Composition of Fiction*.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23. [孙良工:《小说作法讲义》。上海:中华书局, 1923。]
- Wallace, Tara Ghoshal. “‘To One Thing Constant’: The Passion of Pope’s Eloisa.” *The Eighteenth Century*, vol. 56, no. 4, 2015, pp. 411-26.
- Wen, Yiduo. “Comments on *The Winter Night*.”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Wen Yiduo*, vol. 2. Hubei People’s Press, 1993, pp. 62-94. [闻一多:《〈冬夜〉评论》, 载《闻一多全集》(第2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 第62-94页。]
- Wright, Lawrence S. “Eighteenth-century Replies to Pope’s Eloisa.” *Studies in Philology*, vol. 31, no. 4, 1934, pp. 519-33.
- Xu, Jianhui, and Jun Xu. “The Publication Date of the First Edition of Zhang Yiping’s *A Bunch of Love Letters: A Clarification*.”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Studies*, no. 1, 2013, pp. 101-103. [徐建辉、徐俊:《章衣萍〈情书一束〉初版时间辨正》, 载《现代中文学刊》2013年第1期, 第101-103页。]
- Ye, Lingfeng. Translator’s Preface. *The Love Letters of Abelard and Heloise*, by Peter Abelard, translated by Lingfeng Ye, Shanghai Bookstore, 1956, pp. 1-3. [叶灵风:《译者序言》, 载阿伯拉著、叶灵风译《阿柏拉与哀绿绮思的情书》(香港:上海书局, 1956), 第1-3页。]
- Zhang, Yiping. *The Diary of Lying on the Pillow*. Beixin Bookstore, 1931. [章衣萍:《倚枕日记》。上海:北新书局, 1931。]

◇责任编辑:马妮娅